

论宋庆龄抗战思想之演变

On the Evolution of Soong Chingling's Ideology of Anti-Japanese War

朱玖琳

《人文教育 文明·价值·传统——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文集（2007 年度）哲学·历史·人文学科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11 月版，第 305-310 页。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之后，尤其是在 30 年代早期加入共产党之后，她的众多政治活动和言论，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密切相关。她的抗战思想转变在总体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

1931 年，宋庆龄回国后不久，九一八事变即爆发。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当时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序幕”，错误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并认为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由于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仍将主要精力用于“剿共”和镇压国内民主运动，宋庆龄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并加入了共产国际。^①

对于抗日战争，宋庆龄作为一位爱国主义者，始终主张抵抗到底。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宋庆龄赞誉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却仍不顾一切地“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②。她没有像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那样将十九路军按成分划为官兵两个阶层区别对待，而是亲往前线慰问十九路军将士，并在后方发动捐制棉衣运动，筹建伤兵医院，给十九路军将士以安慰和鼓励。

随着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接触日益密切，宋庆龄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共产党渐趋统一。

在这一阶段，宋庆龄抗战言论的主要特点是：将民族战争与阶级斗争并举，认为一切军阀都是投靠帝国主义的，主张直接发动人民抗战，借助民族战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将抗日与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并举，认为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一样具有瓜分中国的野心，帝国主义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进攻苏联，主张反对英、法、美、日等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保卫苏联。

1. “把战争变成内战以推翻资产阶级”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教条地照搬了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宋庆龄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她主张民族解放事业必须与社会解放事业相结合，与“中国民众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释放政治犯的奋斗”相结合。^③也提出“把战争变成内战以推翻资产阶级”。^④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庆龄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是领导抗日民主运动。她创办并领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抗议国民党独裁统治，营救被捕爱国志士；她还参与了发起国民御侮自救会的活动，号召“中国的一切男子、一切妇女与一切的青年，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与义勇军一齐联合起来，组织起来”^⑤，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

2. “侵略并不从日本对中国的强盗战争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起，苏联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斗的最终目标是解决在争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侵略战争中产生的矛盾，是消灭主张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国际因而号召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武装保卫苏联。中国共产党忠于这一号召，为保卫苏联而将斗争对象对准所有帝国主义国家。

这一时期，宋庆龄也认为：帝国主义者世界大战的目的“是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

^① 杨奎松：《宋庆龄何时加入共产党？》，《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3 年第 4 期。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7 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01 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99、100、136、132 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01 页。

继续侵略，与对苏俄的重新进攻。”^①日本的侵华战争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的瓜分中国的运动”，是为了“达到它最后进攻苏联的目的”，“它显然获得国际帝国主义的赞助，尽管帝国主义之间的内部矛盾使英美对于日本的行动发生疑惧。”^②宋庆龄因而也提出了“保卫苏联，反对干涉苏联的战争”这样的口号。

宋庆龄在抗战初期之所以极“左”，除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她的影响外，也有她自身的原因。孙中山生前认为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军阀和帝国主义，他临终前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消灭一切军阀。宋庆龄始终忠实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因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存在许多契合点，所以宋庆龄在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后加入了共产党。也正是上述契合点，使宋庆龄非常认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对一切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治集团与派别”的观点，她把国民党内的派别之争视为军阀内乱，强烈表示反对所有军阀。

孙中山的愿望是孙中山所处时代的客观历史所要求的，但是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当时的急务不是建立苏维埃政府，而是把日本赶出中国。

二、

1933年10月，蒋介石向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一方面，日本在“塘沽协定”后得陇望蜀，继续向我平津推进；另一方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在这一形势下，为了减轻国民党对苏区的压力，帮助中国共产党渡过难关，1934年6月20日，宋庆龄对外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纲领不再使用战争引发革命的理论，而是强调中国所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明显带有扩大统一战线的色彩。

纲领不再强调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并举，片面要求停止进攻苏区，而是以中立者的姿态，呼吁“立刻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日作战；纲领不再强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思想，而将日本定位为唯一的敌人，并呼吁“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纲领不再强调阶级对立，片面开展下层统一战线，而是以爱国和卖国为界限，号召“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事实上，六大纲领早在一年前就已经提出了。1933年10月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信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列出了这一反对日本侵略的六条共同行动纲领。^③很显然这是来自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于法西斯于1933年初在共产国际最重视的德国取得统治地位，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它虽然没有改变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但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战争引起革命的提法，而特别强调起以革命制止战争的问题来。”^④六大纲领是共产国际这一时期的微妙转变在中国问题上的体现。

为了发表六大纲领，共产国际派代表尤金·丹尼斯来华指导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尤金与宋庆龄“好几次长时间共进午餐”，他十分钦佩“孙夫人对新中国前景的看法。”^⑤

1934年4月20日午夜，中共地下党召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议，宋庆龄参加了会议，并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会长的身份，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为题，宣布了六大纲领。^⑥

同日，上海临时中央亦发给各省、县委、市委一封秘密指示信，要求全党执行《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尽量争取一切名流、新闻记者，及其他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自由职业者，作为这一纲领及委员会的发起人或赞成人。^⑦

不久，瑞金党中央指示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与宋庆龄接触，向她汇报江西苏区的困难形势，取得她的帮助，在非共区内发起运动，以减轻被围攻的苏区的压力。是年夏，盛忠亮约请宋庆龄在上海法租界一公寓大楼中会谈了将近5个小时，宋庆龄对苏区遭到的浩劫表示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9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2、128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本）第9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228、231页。转引自张喜德著：《中共对国民党政策的三次转变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258页。

^④ 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7页。

^⑤ 佩吉·丹尼斯著：《尤金·丹尼斯的一生》，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页。

^⑥ 张珏：《“老人节”回忆宋庆龄》，《红旗飘飘》第27辑。

^⑦ 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9—1945.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深切关怀，答应竭尽全力来帮助中国共产党。^①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在宋庆龄的威望感召下，有 1779 位各界人士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名。6 月 20 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公开发表了六大纲领，并同时发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为对日作战宣言》，呼吁全国人民不分民族、宗教、党派，一致拥护《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结成反日统一战线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②

但是，六大纲领的出台并不意味中国共产党的“左”倾思想得到了纠正。除了六大纲领之外，1934 年 4 月 10 日，上海中央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提出七条反帝统一战线纲领。^③6 月 19 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表示完全拥护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纲领，并将七大纲领整理为《反日统一战线五大纲领》。^④

六大纲领与五大纲领在内容上有重叠的地方，但五大纲领仍然是中共“左”倾政策的延续，纲领的第一条便是“坚决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中国共产党将六大纲领作为“全中国民众拥护共产党和苏维埃的抗日主张的最具体最鲜明的表现”^⑤，所以六大纲领在根本上还是中共为反蒋和走出困境的策略之举。从宋庆龄与尤金·丹尼斯和盛忠亮的谈话内容来看，宋庆龄之所以同意出面公布六大纲领也是出于同样的想法，她同样也没有根本转变原来的观念。

不过，六大纲领的公布的确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制定“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方针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三、

1935 年，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遵照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仍将蒋介石排斥在外，视南京政府为卖国政府。

华北事变以后，民族矛盾已明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联共（布）意识到在目前的局势下，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抗日，国共必须为抗日实现统一战线。于是中国共产党也作出了相应反映，表示只要蒋介石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可以在抗日战线上与蒋携手。

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头，宋庆龄的抗战思想同样发生了变化，并以她的特殊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 年底至 1936 年初，蒋介石通过各种渠道开始寻找与共产党接触的途径，宋庆龄便是其中之一。1936 年初，宋庆龄受宋子文之托，委派董健吾和张子华赴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与中共谈判、重建国共合作关系的重要信息。董带回了毛泽东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电。

同时，宋庆龄也应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在为中共联蒋而努力。1936 年 10 月，潘汉年向宋庆龄面交了毛泽东的致函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在信中请求宋庆龄与潘汉年“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并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与潘汉年会面。^⑥宋庆龄不负众望，11 月 10 日，她发表文章呼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⑦

潘汉年当时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动各实力派向蒋要求立即停战抗日”，正值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于是他草拟了“恢复三大政策的提议”致宋庆龄、何香凝、孙科，并运动各实力派签字。^⑧宋庆龄、何香凝随即以自己的名义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中间开展了征集签名的活动。

就在宋庆龄征集提案签名的过程中，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宋庆龄原本支持

^① 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5 页。

^② 《红色中华》1934 年 9 月 21 日。

^③ 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9—1945.9]》，第 43 页。

^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红色中华》1934 年 6 月 23 日第一版；《反日统一战线五大纲领》，《红色中华》1934 年 6 月 23 日第四版。

^⑤ 《尽力帮助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的实现！》，《红色中华》1934 年 9 月 21 日。

^⑥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1—62 页。

^⑦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54 页。

^⑧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3 页。

张学良之举，她事先就知道张学良在计划这类行动，甚至曾通过救国会敦促张这样做。救国会领袖章乃器早在是年10月就说过“不久政府方面会有大的变动”，章被捕后，他的助手吴大琨和夫人胡子婴“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两本密电本，都是与西南、东北军有关人联系的。”^①

但是张学良扣留蒋介石之后，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之间就是否杀蒋的问题产生了矛盾。杀蒋只会对日本最有利，认同这一严重后果后，宋庆龄准备发表声明，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从内容上看，宋庆龄的声明显然源自季米特洛夫12月16日签署的致中共中央电报。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称：“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②宋庆龄的声明谓：“无论张学良的动机是什么，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会认为这是一次不幸的事件，因为它又将国家引入内战的危险之中，而内战将导致更深重的民族灾难，同时也给日本的入侵提供了便利。”^③与共产国际完全否定张学良不同的是，宋庆龄的声明委婉地表示了对张学良的同情。该声明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虽然中共对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一方面表示因电报乱码不知所云而要求重发，另一方面又迅速修正了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和对蒋介石的策略，而且宋子文、宋美龄也飞赴延安与共产党谈判，使得这一声明失去了发表的时效性。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庆龄何香凝修改了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要求“恢复总理三大政策”的提案，1937年2月，宋、何二人一起直接将提案交给了当时正在上海的蒋介石。宋庆龄没有在南京出席会议，2月18日，她在莫利爱路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在沪各外国报纸发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公开信，并附上已向三中全会提出之原案全文。^④宋庆龄在公开信中主张结束训政时期、从早召集国民会议、集中人才、不拘党见、庶民众有实际上参加政府之机会。她呼吁：“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不要使我们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要与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合作。”^⑤

宋庆龄的提案并未能被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接受，这次会议仍然表示要根绝赤祸，但会议首次提出抗日，并表示要和平统一，与中国共产党可以进行谈判。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犯上海，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外敌当前，国共终于携手共御外侮，宋庆龄激动地表示：“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

作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研究室副研究馆员

^① 章立凡：《七君子案与西安事变关系之迷》，《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

^②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③ 《纪念宋庆龄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144页。

^④ 《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1937年2月18日。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8页。